

漫读周末

人世间

一周热评

养老三方协议
不妨推而广之

山东鱼台县的农村里，70岁以上老人，每两年两次，可以到村邻里中心，领取一些政府发放的米面粮油，还会领取孩子们的养老金。之所以有这一现象，是因为2022年以来，鱼台县委、县政府陆续组织全县各个村级组织与老人、子女签订《赡养老人三方协议》，形成子女赡养老人的长效机制。签订协议后，子女须定期将赡养费交给村委会，村委会再将费用交给老人。

有了这样的三方协议，如果子女不付赡养费，村委会就可代为追偿，达到违法程度的，还可以请司法机关介入。这就形成了一种震慑，减少了不孝的现象。所以，总体来说，这种三方契约是一件好事，被山东省民政厅确定为2022年度全省养老服务领域创新典型，可谓实至名归，值得推广。

如果从更大层面来看，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一种定向养老金。这种养老金制度，避免了擦边车现象，多育多得，把生育的外部性回馈给生育家庭，公平合理，也是一个能促进生育的好办法。

“拍黄瓜”或可走出被罚命运

市场监管总局12日公布了新修订的《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，《办法》将从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。《办法》的亮点之一是，对拍黄瓜、泡茶等简单食品制售行为，作出了“简化许可”的规定。

这一修订降低了办理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证的门槛，对中小餐馆经营者来说无疑是一大喜讯。过去，餐馆经营者不是不想办该许可证，但由于办理冷食类许可证要求较高，如制作凉菜要有专间、专人、专门用具、专门消毒、专门冷柜……很多中小餐馆不具备条件，没办法办证。

但“适当简化”这一新表述，如何理解和执行，对餐馆经营者和基层监管部门都是一种考验。“适当简化”究竟从哪些方面入手，简化的“度”如何把握，恐怕地方部门很难科学裁量。这需要出台配套政策给出具体简化标准和指导意见。

整理/大汗

一本花名册 牵出一段共和国绝密往事

**老兵回忆：原广州军区组建80人防化连
深入荒漠执行核试验任务**

6月16日，羊城晚报刊发报道《重返马兰》，记录粤籍马兰老兵时隔多年，重返位于新疆的中国核试验基地，追忆当年为国家国防事业献青春洒热血的奋斗往事。报道刊出后，社会反响热烈，不少当初参与过国家核武器研制及试验、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的老兵们借此联系上羊城晚报，张春雷便是其中一员。

张春雷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、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，曾在部队服役近18年，对于军旅生活，有许多人难忘，有许多事可讲。其中，有一本比巴掌还小的花名册，张春雷珍之重之地收藏了近40年。这本花名册讲述了一段历史：1975年年底，广州军区抽调80名干部战士组建成一个防化连，往西奔赴新疆，秘密参加了一次核试验的效应工作。

“这80人里，最高龄的老兵到如今已有93岁，最小的也有70岁了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知道他们现在何处，如今是否安好。”张春雷提及，48年中，这80名老兵四散在各地，少有联络，也很少提及此事，但随着年岁渐长，也想记录下这段历史，他说：“在这件举国之力的伟大事业中，广州军区未曾缺席，期盼有关部门能多做一点抢救性记录，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。”

1990年，39岁的张春雷转业到广东省第二轻工业厅，之后被分配到广东省工艺美术总公司，机缘巧合下从事工艺美术行业，在端砚和艺术印章雕刻方面造诣不浅，如今他已是首届中国石雕艺术大师、第十三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、高级工艺美术师，有40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、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收购收藏。

多年来，外界与张春雷有关的报道，几乎都是围绕艺术展开，鲜少有人知晓，在这位大师身上，还有过这样一段不为人知往事。据张春雷回忆，1975年年底，根据总参通知要求，原广州军区抽调80人，临时组建一个防化连参与核试验工作，接到任务时，是他当兵的第三年。

“我被抽调过去后，兼任文书和通信员工作，按照职责就整理了一个花名册，把这80人的名字、出生年月、籍贯、所属单位等资料都详细记录下来。”张春雷说道，“一般情况下不会记录得这么细的，也记不得当时是什么心情，驱使我这么做。”核试验事业在未解密之前，曾是国家重大绝密事件，这80名被临时抽调的防化兵的个人档案中均没有记载。

此事，张春雷的这本花名册极有可能就是此事唯一的历史见证，他有意无意间的一个举动，成为历史记录的重要一环。

在近40年的时间里，张春雷一直珍藏着这本花名册，直到2014年，将其珍重交给原广州军区有关部门，以作历史留存。通过复印件可以看到，这本花名册不过巴掌大小，首页记录着核试验的核爆零时：1976年1月23日下午3时。这一刻过后，80名防化官兵心系国防伟业，冒着生命危险，深入核辐射污染区，进行勘测收集数据等核试验效用工作。

为顺利完成这一光荣任务，这80名干部战士先在广州集中培训，进行强化训练并筹备各项物资，直到1975年12月上旬，才乘车西去新疆。

“我们坐的是闷罐车，车上就铺一点稻草，就这样睡在上面，整整走了十多天，才在吐鲁番站半夜下车。”张春雷提到，下车后他们又乘车前往马兰核试验基地，一路上灰尘滚滚，到马兰时都成了泥人，在马兰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又马不停蹄向在罗布泊腹地的核试验场区开去，更为艰苦的环境等待着他们。

被称为生命禁区的罗布泊，荒芜足以吞噬所有，苍茫沙漠中的核试验场区也并不显得突兀，为我国核事业，成千上万人曾在这里奉献青春，甚至失去生命，艰险可见一斑。

吃的是罐头冻肉，少有蔬菜；住的是“地窝子”，一半是往土里挖出的两米深坑，另一半是用茅草搭的简易棚子；喝的水要从百公里外运过来，尤为珍贵，每人每天只有三杯水，早上洗脸的水舍不得倒掉，晚上用来洗脸，更别说洗澡了。

在罗布泊的这段日子里，恰是严寒隆冬，这对长期生活在温暖湿润南方的80名官兵来说，考验不小。“冷到什么程度呢？广州人吃饭的时候喜欢先洗碗，我们拿着碗过一下水，手就黏在碗上了，然后我们排队打饭，直到吃完饭，暖和了一点了手才能拉开。”张春雷印象特别深刻。

80名防化战士一边克服着生理上的不适，一边迅速开展实地实战训练，从第一颗核爆点开始，逐次对十多个核爆点逐点逐段开展侦



年轻时的李经桥



2022年战友合影（最左为张遂志，中为唐昌荣，最右为李经桥）



张春雷

核爆零时属于机密事件，直到当天，整个防化连队才知道准确时刻。

1976年1月23日下午，这支从广州一路颠簸到新疆的80人连队，小部分藏身靠近爆心的洞中，大部分在距核爆心12公里外的沙丘旁整装，队员斗志昂扬，等待着最后的任务的进行。

下午3时，准时起爆，火光冲天，一团巨大的蘑菇云翻滚向上，接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。“爆炸后，火光扑面而来，那一瞬间你感觉这个火不是在12公里外，而是就在你眼前。”张春雷回忆道，核爆成功后，沙丘上欢声雷动，但很快被严肃氛围取代，连长唐昌荣大声宣布：“按照原定计划和路线，各战斗小组进场勘察取样。”

在核爆后的第一时间，在最为危险的时刻，防化兵们进场了。80人团中的一员李经桥也出发了，三人一组，他与队友协作配合执行任务，“这是一种光荣，更是一种责任。”李经桥说，其时他掌握着测量仪器，测试原子弹爆炸后的核辐射程度，“摩托艇越往爆心开，辐射程度不断升高，我们就看着那个指针不断往上升，但还是继续往里走、再往里走，直到按照规定完成侦测任务才返回。”他说。而担任连队指导员的江时清，即使知道核弹威力，到达爆心时也不免感到震撼：“有辆坦克离爆心有几十米，有一定的距离了，但核爆过后，坦克的炮塔还能被冲击波震到十几米外。”

原广州军区为此次核试验任务抽调的80名干部战士，由全军区防化部队中营、连、排、参谋等干部和军事训练尖子组成，都是精兵强将，张遂志估摸

着自己是队伍里唯一的士兵：“我是1975年当的兵，入伍后，平时训练就是利用观测仪快速观测记录核爆后的各种数据，要求手、眼、口并用，反应迅速，报得越多，测量就越准确。”因为基础扎实、反应快，张遂志也被抽调进队伍里。

作为新兵，有幸参与核试验，张遂志既兴奋又害怕：“我们带着仪器往爆心去的时候，一路上见到预设的大炮被掀翻，泥土石子都被烧成玻璃球，像珠子一样，这些都带有放射性物质，我们心里清楚，但任务必须要完成。”

罗布泊荒无人烟，对外界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一台收音机，张遂志最年轻，收音机就交给他背着：“我还记得收音机大概20厘米高，10厘米厚，有长长的天线，在车上也好，吃饭也好，我都背着它。”

整个队伍靠着这台收音机听新闻，直到有天，从广播里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，队伍沉默了，哀痛万分，但又很快继续投入到新一轮作战中去，在时间更迭中，为伟大的事业，接续奋斗。

核爆过后，全队员在核爆下风方向，按照事先设定的不同距离、不同时间、不同方向，连续几日进行认真的勘察和记录，在将所有勘察数据结果交给现场指挥部后，这支80人小队踏上返程之旅，重回各自岗位，此后长久时间里绝口不提曾参与过这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。

战斗在荒芜的罗布泊，常不知时日。张春雷还记得，返回广州的那一天夜里，在车上突然听到鞭炮声响，外头一片热闹，才恍然发觉，那天恰是除夕夜，新的一年快到了。

对于满腔热血地加入含羞草项目的支教老师们来说，哪怕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再开放包容，也会经历一场理念的更新。

方蕾是去年加入含羞草项目的一名支教老师。在面试时，她被问到“你觉得娘娘腔要不要治？”她愣了一下，心里只是觉得娘娘腔就是一个现象，这么去说别人好像不太好。她也不明白该如何界定娘娘腔，所以只能向面试官坦白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。

但在培训时，她才意识到“娘娘腔”其实是社会刻板印象的一部分。“大家觉得男性都应该说话很阳刚，所以当少部分男性不符合这个标准时，我们就会觉得他‘娘娘腔’。但其实这是在用部分人的特征来规范所有言行。”

方蕾很受震撼，“这就意味着，不是说娘娘腔很难界定，而是我根本就不该去界定它。”

在试讲环节，方蕾也经历了一场“脱敏”。面试官向她展示了一场性教育授课，课件中包含了许多与性有关的词汇，她被要求在两天内，把这堂课练习讲。尽管已经步入社会多年，方蕾在听到这些词时仍感到心跳

剧烈。为了“脱敏”，方蕾练习了五六次，还让自己的女儿在一旁听，确保自己的讲解“不会显得色情”。

支教老师们经历了培训，为的是把性教育知识大大方方地呈现给山区的孩子。凌玮发现，相比城市里的孩子，山区里的孩子由于父母不在身边，接触到的性知识更复杂且疏于引导。当支教老师们给他们上性教育课时，他们会称老师们为“流氓老师”“黄老师”。“他们对性教育知识有羞耻感，为了遮掩这种羞耻感，他们会故意表现得戏谑、不屑一顾。”凌玮说。

然而，随着课堂深入，孩子们逐渐感受到支教老师们认真的态度，自己的态度也随之严肃起来。凌玮发现，当老师们讲解完女生的月经现象后，班里的男生看到女生的卫生巾不会再开玩笑。在课堂上讲授性知识，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们“脱敏”，洗去性羞耻感。“当我们在课堂上面不改色地谈这件事，学生们也意识到这件事没什么敏感的。那么万一当侵害事件发生时，他们就能够及时求助。”支教老师金梁告诉记者。

凌玮意识到自己的边界，就能预防侵害事件的发生。”凌玮告诉记者。

让方蕾感到欣喜的是，当她教导孩子们互相尊重身体边界时，他们的尊重也会延伸到思想边界。在一个五年级班级上完性教育课后，一名女生在课后向自己的同学表达对这门课的喜爱，但对方不同意她的观点，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出一句“好的，我尊重你”。

在游戏中，孩子们逐渐意识到异性之间存在身体边界：当男生想触碰女生的肩膀和腰部时，有的女生表示同意，有的女生表示拒绝。“通过这样的观察，孩子们就会理解，人和人之间的感受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

大山里的性教育课堂

在性教育普遍缺失的山区，支教老师肩负起孩子们人生中的关键一课



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

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的小学里，一场由支教老师带来的课堂正在开展。不同于常见的语数英课程，这门课讲授了男女身体构造、生殖器官，甚至还有性行为是如何发生的。

这是杭州“六个大包”公益服务中心含羞草性教育项目的课堂。在课堂上，支教老师为孩子们讲授青春期身体变化，教导他们保护自己，互相尊重身体边界。在性教育普遍缺失的乡村地区，这些知识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重要启蒙。

一大摞奖状，但在助学途中，她却主动辍学回家。在回访中，工作人员特地去拜访了这个女孩，才发现辍学的真正原因——她遭遇了性侵。“我回不去了。”面对继续回去上学的劝告，女孩的回答简单且无奈。

此后，“六个大包”公益服务中心开始着手规划性教育项目，并取名为含羞草。“含羞草在孩子们的认知里，是一种懂得自我保护的植物，当感觉到危险和伤害来临时，它就会把叶片收缩起来，保护自己。”凌玮说。

李春元是含羞草性教育项目的支教老师，对他来说，关注到性教育领域另有原因。李春元曾在湖南安化支教，一个人负责十多个孩子的语数英课程。当时孩子们都

在三四年级，发育得早的孩子身体上已经有一些变化，同学们感到好奇，又无处求解。

在教学过程中，李春元发现相比学科知识，性知识能让更多的孩子受益。“语数英这些学科知识总会有人教的，是不会缺乏的，但性教育不一样，如果我不做，孩子们可能就少了这一课。”

为此，李春元自学了专业性教育机构的上课案例，给孩子们上性教育课。课程的效果立竿见影：平时没有穿内裤习惯的孩子们开始穿上内裤了，青春期的女孩子们也开始给自己购买胸衣。

时间一长，李春元觉得给自己班上的孩子们科普还不够，他想给更多的孩子们讲授性教育相关的知识，这也促使他加入了含羞草项目。

『娘娘腔要不要治？』

『尊重对方的边界』

『身体记住了伤害』

凌玮是含羞草性教育项目的负责人。她曾在大学做过心理辅导老师，她发现即便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群体，对于“性”的认识依然模糊。在给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做讲座时，凌玮发问：“如果发生性行为后，女生意外怀孕了，应该怎么办？”“做人流！”学生的回答，让凌玮有点不知所措。追问之下，凌玮发现，在这些已经成年的学生中，竟没有一人知道人流手术的具体过程，“人流”二字在他们脑海中的印象就是电视上无痛人流的广告，他们都以为那是一个轻松的过程。

在心理咨询室，凌玮发现性教育缺失对青少年成长构成影响。她曾接待过一个童年受过侵犯的女孩，在之后

